

文学研究

# 走向当代的文本阐释诗学\*

——公共阐释论与中国当代文本阐释诗学的理论建构

段吉方

**【提要】**从文本阐释的角度切入中国阐释学的当代建设是中西阐释学理论所给予的理论启示。深化中国当代文本阐释诗学的理论与实践是建设中国阐释学的路径之一。中国当代的文本阐释诗学并非是要建立一种新的阐释学理论,而是要强调重点从文本阐释的角度出发,将中国阐释学的研究与发展根植在不同文化语境的文本阐释的基础之上,倡导中国阐释学的理论与实践自文本始,经过充分的文本阐释工作,最终走出文本,锤炼文本阐释的诗学、美学与哲学特质。公共阐释论及相关论述揭示了西方阐释学与中国阐释学在文本阐释诗学构建中的理论资源,提出了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新思路,对推动和加强中国阐释学的当代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公共阐释论 文本阐释 对话 中国阐释学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9)04-0106-08

汤一介先生曾于2000年始先后撰写《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sup>①</sup>而建立中国阐释学(解释学)就是中国当代阐释学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汤一介先生通过对郭象注《庄子》的方法的系统挖掘,整理中国传统哲学在注释经典传统上的“寄言出意”、“辩名析理”、“章句详解”、“用‘纬’证‘经’”等独特的阐释方法,并在阐释方法论上强调“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之不同。他认为:“如果能对中国历史上对经典注释的方法加以梳理,也许可以总结出一套中国解释学的方法和理论来,这样才可以形成并有利于与今日流行的西方之解释学(Hermeneutics)的平等对话和交流。”<sup>②</sup>中国阐释学的研究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若想真正达到汤一介先生当初的理论构想——总结中国阐释学的方法和理论,建立能够与西方阐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17ZDA269)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汤一介:《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第83~90页;汤一介:《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2期,第16~20页;汤一介:《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学术界》2001年第4期,第97~113页。

② 汤一介:《辩名析理:郭象注〈庄子〉的方法》,《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第52页。

释学平等对话的中国阐释学理论，无论是对阐释的方法论层面，还是对中国阐释学的哲学、思维和观念层面的总结和凝练，都需要更加深入和细致的工作。“中国阐释学”不能简单等同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阐释方法”，中国阐释学的学派观念和理论宗旨观念的建设才是基础。本文从目前中国当代阐释学研究中受到较多关注的阐释的公共性问题以及公共阐释论出发，提出创建中国阐释学需要首先在文本阐释学的理论与实践等基本的阐释学目标与任务方面做出扎实的研究，然后再谈创建中国阐释学的路径与规划。目标是围绕中国当代文本阐释诗学的理论建构问题，对中国阐释学的研究与发展展开相关思考。

## 一、文本阐释与阐释学研究的哲学普遍性

在阐释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文本阐释的问题是最早进入阐释学的理论核心问题的。西方的阐释学理论有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从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西方阐释学理论经历了一般阐释学、作为人文科学普遍方法论的阐释学、作为本体的阐释学，最终推进到哲学阐释学。哲学阐释学充分展现了阐释学研究的哲学普遍性，将阐释的问题从一种理论、方法、观念上升为关于阐释的实践哲学。伽达默尔认为，这种阐释“并不是要为科学或生活实践制定规则，而是试图去纠正对这些东西究竟为何物的某种错误的思考”。<sup>①</sup>西方阐释学理论发展的现实似乎也预示了，随着阐释学理论的不断向纵深发展，阐释的行动和哲学囊括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只要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发展存在理解、认识的行为，就离不开阐释。在这个过程中，阐释的对象、范围、论域以及行动实践本身也不断扩大，最初作为“赫耳墨斯之学”的《圣经》阐释的学问已经走向了更广泛的广义阐释学。阐释学理论的纵深发展中已经不见了《圣经》，似乎不需要文本了。这种阐释学理论发展的状况，既是一种基本的理论事实，但同时也是太过笼统的认识判断。如果深描阐释学理论的发展，我们会发现，支撑和促进其发展的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并没有被忽视。其中如何对待文本，如何恰当地进行文本阐释，恰恰是阐释学理论发展中不可逾越的理论起始工作。无论阐释学理论与阐释行为如何走向更丰富、更深刻的理论创造，其最初以及后来的理论研究都没有忽略文本以及文本的阐释。文本与文本阐释的传统与方法由来已久。文本、阐释、对话、融合、意义、真理、价值，这些关键概念与范畴的提出和论证不断出现在各种阐释学理论与阐释学批评之中，而且构成了阐释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问题。

在阐释学研究中，文本以及文本阐释是一个理论起源性的问题。可以说，阐释学理论的发展自文本开始，经过文本阐释的各种不同方向的理论发展，最终才走向阐释的哲学。西方阐释学理论曾经不同程度地重视文本和文本问题。在阐释学理论的起始阶段，施莱尔马赫的一般解释学曾强调解释学的普遍任务就是以文本为核心的对作者意图的揭示。他论述的“解释学的循环”、“理解的艺术”等概念是阐释学研究的基本理论范畴，均是以文本为中介的。所以有的研究者说施莱尔马赫的一般解释学“关注的是文本”，<sup>②</sup>这丝毫不为过。当然，施莱尔马赫把解释学的文本局限在《圣经》上，曾引发狄尔泰和伽达默尔的质疑。在施莱尔马赫之后，狄尔泰发展了施莱尔马赫的一般阐释学，强调作为方法论的阐释学，认为阐释学能够为其他的人文学科提供一个完整的方法论基础。为此，狄尔泰强调理解的方法，强调文本阐释中历史经验的重要性。在他的阐释学理论中，文本被扩大了，

① [德]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② [美] 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伽达默尔》，何卫平译，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4页。

文本从施莱尔马赫的直觉和感觉的对象，变成了历史经验的阐释载体，并内化为人类生活客观化的体验形式。这种基于文本和文本阐释的阐释学研究思路一直影响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他们也正是从如何正确对待《圣经》等的文本阐释、如何有效推动人的阐释和理解的角度，才把阐释学的研究推向深入的。可以说，在伽达默尔之前的阐释学理论中，文本的阐释与方法问题是阐释学的核心。西方阐释学的理论在经过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转换，特别是在海德格尔引入语言、存在问题的阐释研究之后，文本阐释的问题逐渐淡出了阐释学的核心。而在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中，文本被广义的语言、理解等哲学解释学的问题化约为隐形的阐释学研究的基础。但在《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中，伽达默尔仍然强调：“理解文本和解释文本不仅是科学深为关切的事情，而且也显然属于人类的整个世界经验。”<sup>①</sup>所以，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并没有忽略文本与文本阐释。他所强调的“视野融合”、阐释学的“效果历史”及其最终之理论的检验，其实都包含着一个隐形的文本的概念。他的哲学解释学不断谈论的艺术、游戏、语言哲学等问题的背后仍然有一个基础性的阐释学的文本的观念存在，只不过这种文本不是“一个”文本，就像他说的经验，也不是“一个”经验，而是作为整个哲学解释学的普遍性的文本与经验。

对于阐释学的研究而言，阐释学以及文本阐释诗学的问题也并不就一定就仅限于施莱尔马赫、伽达默尔等的西方阐释学的理论传统。阐释学是当代哲学与思想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是广泛涵盖了中西文化与哲学发展历史的思想原生问题。阐释学研究中的文本与文本阐释问题也是如此。除了施莱尔马赫、伽达默尔之外，中国传统语言文化以及文论中某些重要的阐释学的观念与方法，如“文以载道”、“以意逆志”等，也广泛涉及了阐释学研究的文本和文本阐释的问题。相比西方阐释学理论，中国阐释学在系统化的理论表述上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在文本阐释的层面具有明显的理论表现。首先，从先秦时期对《诗经》的阐释，到汉代对楚辞的阐释，以及宋代文论对唐诗的阐释，其中均蕴含着深刻的文本阐释的观念。其次，中国阐释学中的文本阐释具有非常明显的美学和艺术特质。与伽达默尔等人的阐释学将艺术和美学问题作为阐释学的一般问题加以论析不同，中国古代的阐释学方法与观念在美学、艺术问题上的见解是在阐释行为的内部发生的，是就文本本身的阐释发散而出的。或者说，很多阐释行为是在文本的美学和艺术层面发生的。这一点可以从中国美学史中获得结论。如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意境”理论，强调的就是文本阐释的一种美学特征。对阐释而言，意境在哪里？如何体验？这要从具体的文本上见出。这也正是文本阐释的结果与目的之所在。由于中西哲学、文化、美学在语境、背景、传统等理论生成上的差异，以及理论思维、理论判断与表达上的不同形式，二者关于阐释学的研究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别，在阐释的方法、本体以及表达方面，走向了不同的阐释学研究的道路，并最终影响了作为一种理论和思想的阐释学基本问题的存在方式及其表达方式。这种理论差异自然也影响了阐释学中的文本阐释的不同方向与特征。但无论如何，在阐释学中，文本构成了阐释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可靠性来源。无论是西方阐释学，还是中国阐释学，在理论发展的基本依据及其理论建构的层面上，都不能忽略文本与文本阐释的基本功能及其始源性价值。

## 二、阐释的公共性及其文本视野

阐释的公共性问题是张江教授在《公共阐释论纲》中着重提出并论述的。张江教授在《公共阐释论纲》中谈到：“阐释是一种公共行为。阐释的公共性决定于人类理性的公共性，公共理性的目标

<sup>①</sup> 《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第17页。

是认知的真理性与阐释的确定性，公共理性的运行范式由人类基本认知规范给定，公共理性的同一理解符合随机过程的大数定律。”<sup>①</sup> 阐释是否为公共的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是公共的？阐释的公共性对阐释学的研究以及阐释的意义与价值有什么影响？这是当代阐释学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公共阐释论纲》中，张江教授着重从认识论的角度，论述阐释的公共性。他提出了公共阐释的六个特征：“第一，公共阐释是理性阐释；第二，公共阐释是澄明性阐释；第三，公共阐释是公度性阐释；第四，公共阐释是建构性阐释；第五，公共阐释是超越性阐释；第六，公共阐释是反思性阐释。”<sup>②</sup>这六个方面的特征可以说是阐释的公共性的认识属性的规定。在阐释学的意义上，由于阐释、理解与人的认识、实践乃至本体存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从认识论的角度探究阐释的公共性其实也是在理性、价值等层面上对阐释活动做出了明确的说明。因而，在阐释学的基本问题研究层面上，公共阐释论提出了当代阐释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阐释以及阐释的行为如何以其对人的认识行为、理性活动与哲学实践的系统观照，走向社会公共文化与公共领域。阐释是公共的，阐释是理性的，也就意味着阐释行为是公共的文化、公共的理性，是公共的文化创造的一部分。

在西方阐释学理论中，至少有两方面的重要因素与阐释的公共性问题相关。首先，在西方阐释学漫长的理论发展中，从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形成了一般阐释学、作为方法论的阐释学、本体阐释学、哲学阐释学的连贯而有明显理论呼应的学术传统。但平心而论，无论是施莱尔马赫、狄尔泰，还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他们的阐释学研究都不是当代的“显学”。当代哲学以及美学、文论研究中最受关注的学者不一定是他们。那么，为什么在当代阐释学的研究能够不断引发新的讨论，不断走向理论研究的新进展呢？关键就在于阐释学是有学术传统积淀和思想传承的理论，用伽达默尔的话说就是：“它启发了人的创造、生产和构造活动对于其所受制的必要条件的现代态度。”<sup>③</sup> 伽达默尔面对阐释学研究，曾慷慨陈词：“当科学发展到全面的技术统治，并因而导致‘在的遗忘’的‘世界黑暗时期’这种尼采曾预言的虚无主义时，难道我们要目送黄昏落日那最后的余晖，而不欣然转身去期望红日重升的第一道朝霞吗？”<sup>④</sup> 很显然，伽达默尔希望从阐释学中看到现代哲学的希望，所以他将阐释学上升到哲学的普遍性即实践哲学高度。而任何这样的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公共性的哲学问题以及进入社会公共文化领域的问题的探讨。阐释学的学术积淀与思想传承更是让它以一种公共性、普遍性的哲学理论不断突入当代学术前沿。明确地说，阐释学本身就是公共的学术。其次，阐释的公共性问题在伽达默尔后期强调的阐释学的一般性中有十分明显的理论呼应。伽达默尔曾经谈到，阐释学不仅仅是方法或本体，而且是追求阐释的哲学或阐释的一般性的，“方法论问题是完全由对象所规定的”，<sup>⑤</sup> 而阐释学只有“被扩建成为一门关于本文理解和解释的一般理论时，它才获得其真正的规定性”。<sup>⑥</sup> 在哲学上，阐释的一般性与阐释的公共性问题紧密相连，阐释的公共性既是阐释行为、阐释活动的公共性，也是阐释学研究的理论内部所涉及的问题普遍性。阐释活动的公共性与阐释学研究中的“效果历史”即阐释的有效性等问题有着理论上的互文性。在阐释学的意义上来讲，这也是历史的真实和阐释的真实的统一。这说明了无论是阐释的行为、阐释的过程，还是阐释的理论，都蕴含着公共性的问题。

① 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第1页。

② 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第1页。

③ 《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第14页。

④ 《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第14页。

⑤ 《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第406页。

⑥ 《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第421页。

阐释的公共性问题同样重视文本及其文本阐释,张江教授提出的公共阐释论具有开阔性的文本视野。在阐释的公共性角度上,文本的价值在于阐释的无限性和开放性。阐释有了开放性和公共性,对于文本阐释而言,同样是一种意义的再造过程,是一种新的视域融合。他强调:“公共阐释的内涵是: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sup>①</sup>“以文本为意义对象”是指“承认文本的自在意义,文本及其意义是阐释的确定标的”。<sup>②</sup>以文本为核心让公共阐释论具有了一个明确的理论立足点。在这个立足点上阐释的公共性问题不仅呼应了西方阐释学中的文本阐释观念,而且深入总结了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中的阐释的文本问题。这也是张江教授在提出其公共阐释论之后着重探究的理论内容。在提出公共阐释论的过程中,张江教授沿着公共阐释论的基本思路,以文本阐释为核心,对阐释学研究的一般问题做出了知识考据层面上的研究。在《“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中,张江教授从汉语言文字造字之法的特征出发,辨析“阐”、“诠”的词源学和语义学特征,追溯“阐释”之“阐”与“诠释”之“诠”的各自深厚的哲学和历史渊源。他强调:“‘阐’之公开性、公共性,其向外、向显、向明,坚持对话、协商之基本诉求,闪耀着当代阐释学前沿之光。‘诠’之实、‘诠’之细、‘诠’之全与证,其面向事物本身,坚守由训而义与意,散发着民族求实精神之光。”<sup>③</sup>他还强调了中国古代的阐释路线,即一条重训诂之“诠”,一条重意旨之“阐”的“两条理论路线”的差别与意义。《“理”“性”辨》则在文字与语义学的意义上,辨析中西“理”、“性”各自的意义分野及其对阐释学研究的不同影响,强调“中国之理,是实践理性之理,乃实践智慧的直观表达;西方之理性,是理论理性之理,乃理论智慧的逻辑表达”。<sup>④</sup>《“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理”“性”辨》有效承袭了《公共阐释论纲》中关于阐释的公共性研究的理论思路,在文本阐释的具体性上做出了深入的理论辨析。这种研究思路和内容不但广泛涉及了公共阐释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表现,而且本身就是文本阐释的有效例证。相比西方阐释学研究中的的一些核心概念,如“前见”、“解释的循环”、“视域融合”等,阐释的公共性或是公共阐释论不是作为一个“概念”或“范畴”而提出的,抑或是作为一个阐释学的“理论”而出现的,而是代表了一种阐释学的立场和观念。对于中国阐释学研究而言,这种阐释的立场和观念具有积极的意义。它不是对西方阐释学的一般问题作出解说或者注解,而是更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思想中找寻阐释的公共性理论依据或者观念佐证,追求的是“基于中国古代文化与哲学传统,借鉴西方哲学及理性方法,可为当代阐释学基本规则的重要根据”。<sup>⑤</sup>我们可以发现,这种阐释规则和理论不但有文本,而且发展了文本;不但强调文本阐释,而且不拘泥于既定的文本阐释,同样从文本阐释走向了更加广泛的阐释学理论。这种阐释学理论的初衷与目标是:“以中国话语为主干,以古典阐释学为资源,以当代西方阐释学为借鉴,假以对照、选择、确义,由概念起,而范畴、而命题、而图式,以至体系,最终实现传统阐释学观点、学说之现代转义,可建立彰显中国概念、中国思维、中国理论的当代中国阐释学。”<sup>⑥</sup>

### 三、公共阐释与当代中国文本阐释诗学的理论构建

早在强制阐释论的研究中张江教授等就强调,面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发展,实现与西方平等对

① 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第2页。

② 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第2页。

③ 张江:《“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第12页。

④ 张江:《“理”“性”辨》,《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第176页。

⑤ 张江:《“理”“性”辨》,《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第176页。

⑥ 张江:《“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第12页。

话的途径，一定是在积极吸纳世界文艺理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本土，坚持以我为主，坚持中国特色，积极打造彰显民族精神、散发民族气息的中国文艺理论体系。公共阐释论更明晰地展现出中国阐释学研究建构的理论导向性，在阐释的立场与观念上展现了当代中国阐释学理论的内容与价值，具有了建立中国阐释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与观念特征。中国阐释学的建设与发展如何考虑中西阐释学理论发展的不同特征，如何有效借鉴西方阐释学的理论成果，整合和发扬中国阐释学的资源与理论传统，特别是在中西阐释学的不同理论传统中如何找到能够相互融通促进的阐释学理论研究的支点，以推动中国阐释学的发展，在这些方面公共阐释论给我们提供的启示是积极而明显的。

公共阐释论给我们提供的启示首先在于，阐释学的理论研究若走向更丰富、更深刻的理论发展，需要从阐释学研究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理论原则的清理、梳理及建构出发。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需要扎实推进中国当代文本阐释诗学。因为文本是阐释的起点，文本阐释是阐释学研究首先要经历的理论关口。英国学者伊格尔顿曾认为，随着伽达默尔的重要论著《真理与方法》（1960年）的出现，“我们需要对一直折磨现代文学理论的一些问题进行争论”，<sup>①</sup>如“文学的文本是什么意思？作者的意图与这种意思怎样联系？我们是否有希望理解那些从文化上和历史上都与我们相异的作品？‘客观的’理解是否可能？或者是否一切理解都与我们自己的历史处境相关？”<sup>②</sup>伊格尔顿所说的文本与阐释学中的文本概念有一定的差别。伊格尔顿是在美学和文论的层面上强调文本阐释的意义。这个文本概念区别于“作品”，强调的是符号学、叙事学、批评学意义上的“复数的作品”。就像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曾经提出的，文本不是作品，文本“是一种方法论的领域”，是“对符号的接近”。<sup>③</sup>这样的文本概念拒绝了作品—作者联系链条上的作品概念，突出了符号化、生产性的文本概念，也让文本阐释批评能够更多地围绕文本的生产与意义特性而展开。阐释学意义上的文本当然不能完全重复美学或文论层面上的文本概念，但与其有明显的重合。在阐释学意义上，文本的概念不仅仅是符号化的，而且是对象性的。《圣经》的文本、神学的文本、文学的文本，这些文本既是阐释学的对象，同时又对阐释学理论具有反向建构的作用，即意味着没有文本的阐释的基本依托，阐释学就失去了理论上进一步展开的空间和依据，更失去了理论的承继关系。阐释学意义上的文本是创造性的文本，是视域融合中的文本。文本被阐释，文本被理解，同时也在创造新的文本，产生文本对话，而且阐释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对话大多也是从文本出发的。所以，阐释学的意义生成与发展离不开文本，在文本的基础上建立的阐释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也是阐释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张江教授提出的公共阐释论也强调：“阐释生成的确定语境要求个体阐释是可共享的阐释。阐释的目的是交流。交流的前提是理解，尤其是交流主体间的共享理解。在确定语境下，阐释不是任意的。无论对象词语包含多少衍生意义，确定语境规制语义的有限性。共同语境下的历史主体，理解的历史性，不能脱离自在话语的本来意义。同一主体的不同理解，是不同语境下的不同，如此理解不被共享，则应归属私人理解而失去阐释意义。”<sup>④</sup>要做到这一点，在阐释的过程和实践上，围绕阐释的对象，不断创造阐释的视域融合是一个关键问题。在不断的视域融合中，文本意义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以及文本的开放性获得极大的发展，文本阐释的过程与意义也日益彰显。在这个层面上，文本阐释的公共性

① [英] 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王逢振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4～65页。

② 《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64～65页。

③ [法] 罗兰·巴特：《从作品到文本》，杨扬译，《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5期，第87页。

④ 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第5页。

本身也是文本形式的重塑，是阐释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呈现。这恰恰是以文本为意义对象的公共阐释活动得以落实到阐释行为中的核心。

以阐释的公共性研究为切入点，以文本阐释为意义对象建立中国阐释学，还需要充分挖掘中国的阐释学的资源与方法。西方的阐释学曾被视为当代人文学科中最重要的学问，阐释学理论的发展和更新均围绕文本和读者的视域融合等核心问题而展开，其中涉及了许多阐释学的关键问题。西方阐释学理论经过了几个理论轮回的发展，到了伽达默尔那里走向了集大成的理论意义。相比西方阐释学，中国阐释学的建设与发展的历史更加悠久，但分歧尚多，特别是在理论建设的路径与方向上仍然有很多争论，走向中国阐释学的理论集大成仍然需要更多的努力。面对中国阐释学的研究，学者们给出的方案或者路径大多是在以西释中和化古通今的道路上踟蹰论争。毋庸置疑，在阐释学不同理论资源的选择和中国阐释学理论建构的路径上，中国古典的阐释学资源和西方阐释学理论均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如何有效吸收中国阐释学的资源和方法则是关键。这个关键不能最终停留在总结、梳理和个案挖掘上。重要的是形成关键概念、范畴、理论观念、体系建设上的理论标识，达成理论共识，并真正走向中国阐释学研究的理论内部，改变疲于跟进西方阐释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路径，切实推动中国阐释学研究理论与理论建构的具体过程，进而落实重建中国阐释学的系统理论方案。对中国阐释学的建设而言，西方阐释学理论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当代的阐释学研究已经较为系统地关注了西方的阐释学理论。这里面有理论研究的合理选择，也存在阐释学研究的片面冲动。理性地认识西方阐释学资源之于中国当代阐释学研究发展的启发，在西方阐释学的理论反思中走向中国阐释学的理论建构，在此方面，公共阐释论的研究做出了很好的理论探索。一般说来，由于学术研究与学理判断的时效性影响，越接近当下理论发展与理论变革的观念越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公共阐释论的研究也是如此。公共阐释论的研究能够迅速进入当代学术界的视野，主要原因在于其对中国阐释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基础提出了积极的规划。在《公共阐释论纲》之后，张江教授就阐释学的研究与西方很多权威学者展开了对话交流。其目的是在对话中为中国阐释学寻找建设的有效路径和话语策略。张江教授通过与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主席米勒、杜克大学教授哈派姆、欧洲科学院院士西奥·德汉、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的对话，在积极交流中，不断深入探讨中国阐释学研究过程中的问题，并提出新的解决思路和构想，为中国阐释学的研究及其话语体系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阐释的公共性研究打开中国阐释学研究的理论视野和空间的同时，这里仍然要重提中国当代的文本阐释诗学的建设。文本阐释诗学是一种扎实的基础性的阐释实践，是一种阐释学理论建设的准备和预期工作。什么是文本阐释诗学？文本阐释诗学强调阐释学的理论研究或是中国阐释学的理论建设首先要在文本层面上清理阐释学的有关问题，强化阐释学批评的文本实践，重视概念、范畴及理论基本规则层面上的原初发动，进而在文本阐释的基础上走向中国阐释学的理论体系建设。从这个层面上说，文本阐释诗学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阐释的诗学或美学。这种阐释的诗学或美学不一定就要将中国阐释学的研究局限在文论或美学范围内，而是指文本阐释自带的一种美学和艺术特质。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经典的阐释，如何深入挖掘这种美学和艺术的特质，中国阐释学的研究还没有系统性地完成这种工作。

此外，以公共阐释论的研究为标志，中国阐释学的研究仍然需要在阐释的公共性、哲学的普遍性上继续努力。伽达默尔最终强调阐释学走向实践哲学以及阐释学的普遍性，就是因为他认识到一般阐释学、普遍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阐释学、存在论意义上的阐释学，最终都难以将阐释学上升到统摄人类所有认识活动和理解活动的高度，只有作为实践哲学的阐释学或哲学阐释学才具备这个可能。因为走向哲学的阐释学，才能够在哲学的普遍性上使阐释学在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发挥更有

力的作用，才能化解“效果历史”的矛盾。中国阐释学研究也是如此，阐释的公共性、哲学的普遍性问题的研究仍然需要深化和推动。对阐释学而言，仅仅停留在知识论意义上的“理论”与“学问”的阐释学研究，就仍然没有破除阐释的“前理解”的困境。而就中国阐释学的建设路径而言，什么是中国阐释学的核心概念、范畴和基本的哲学问题等，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明确。除此之外，中国阐释学研究的本土化和中国化的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思考。在这方面，公共阐释论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已经着眼于中国阐释学研究的现实，开始提出中国阐释学研究的核心概念、范畴，努力探讨中国阐释学建设的理论框架和理论范式，努力在西方阐释学与中国阐释学理论研究的观念与资源中做出理论自治性的反思。这对于中国阐释学如何走出单向接受西方阐释学研究的困境，规避西方阐释学的理论旅行的弊端，进而深化中国本土的阐释学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公共阐释论仍然是一门发展中的学问，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阐释学的基本问题。对于目前的公共阐释论研究以及中国阐释学的建设而言，充分的前期准备是必要的。有效总结西方阐释学研究的有益经验，系统观照中国阐释学理论发展的方法与观念，提出建设中国阐释学的合理路径，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需要包括公共阐释论在内的阐释学理论研究的不断加强与推动。

本文作者：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左杨

## The Textual Interpretation Poetics Heading to the Contemporary Culture: Public Hermeneutics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Textual Interpretation Poetics

*Duan Jifang*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hermeneutic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xtual interpretation is the theoretical inspiration brought by the theori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hermeneutics, and deepen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textual interpretation poetics is one of the ways to construct hermeneutics in China.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textual interpretation poetics does not aim to establish a new interpretation theory. It emphasize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xtual interpretatio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ermeneutics should be rooted in the textual interpretation in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It also claims tha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hermeneutics should be based on texts, and after a full textual interpretation work, the text is finally removed and the textual interpretation poetics is tempered with aesthetics and philosophical qualities. Public hermeneutics and related discourses reveal the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western hermeneutics and Chinese hermeneutic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extual interpretation poetics, put forward new 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which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hermeneutics in China.

**Keywords:** public hermeneutics; textual interpretation; dialogue; hermeneutics in China



## 段吉方教授简介

段吉方，男，文学博士、博士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审美文化与批判理论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广东省优秀教学团队负责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理事，中华美学学会马克思主义美学专任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4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2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项，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项。获得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3次、三等奖1次。出版《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理论的再生产——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理论、问题与方法》《文化唯物主义与现代美学问题——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范



式与经验研究》（入选《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审美文化视野与批评重构：中国当代美学的话语转型》等专著，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

段吉方教授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美学基础理论、西方现代文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化理论、比较诗学、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等，近年来在中国当代文艺学、美学基本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代表性论文有《理论的终结？——“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形态及其历史走向》（《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重建“对话”思维——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及其意义》（《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理论、问题与实践》（《云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相关成果结合中国当代文艺学、美学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如反思批判“文艺学危机论”、“日常生活审美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后现代主义文论与中国经验”等问题，从中国当代文艺学、美学研究的理论经验的话语体系出发，提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构建中的“中国经验”问题。研究成果受到学界重视。

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研究与学理建设，是段吉方教授近年来用力甚多的研究方向。其研究成果积极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相关经验与理论启示融入中国问题，努力探索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批评的有效实践方式，在促进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学理建设，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代表性论文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生产转向及其理论意义》（《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论20世纪英国文化研究中的“葛兰西转向”》（《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感觉结构”与“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踪迹——雷蒙·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美学的理论细读》（《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范式及其学理建设》（《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获得《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度“钟山文艺论坛”栏目优秀论文奖）。

（左 杨）